

杏林述珍



中医药史概要

精本库

R2-09
752
12

杏 林 述 珍

— 中医药史概要

傅维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202658

杏 林 述 珍

——中医药史概要

傅维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2 印张 5.375 字数 117,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5-0965-6

R·59 定价：2.10 元

序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明，而今，则更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现实是既往的继承，客观的存在是不容也不能否定的。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绵延与从未出现断层，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认识，也是我们自己务必珍重爱惜，务必立志进步并努力宏扬的，以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更辉煌的现实，更光明的未来，从而不断地为人类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悠久与灿烂，也是世界文化科学史与人类学研究者历来探索的重大课题之一。何以这个民族能够这样呢？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应是这么一条，即这个民族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以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在农业和医学两方面做得最出色。民族之绵延与文化之未出现断层，首先是赖此二者以获得保证的。所以，全世界的人们多以惊异的眼光来注视中国的农业历史和医学历史。那我们自己呢？

说明此种情况之前，有必要明确展示一项我们民族文化总体的特质，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科学，都是沿着自己传统的思维方法和模式前进的，所以任何事物一概形成了自己的

2k67/60

特色和独特的创造。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医学”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其理、法、方、药的体系，望、闻、问、切的诊术，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与经验等，真是有着众多繁复的套数。相形之下，农学的理论与技术就没有这么多繁复的创造。所以，中医学和中药学历来就受到各方的重视，并被共同视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来加以探索、研究和应用。它很早就东传到日本和朝鲜，朝鲜称它为“东医”，日本称它为“汉医”；西传到阿拉伯国家，从十世纪前后为伊卜拉罕·本·瓦西夫 (*Ibrāhim Bin Wāṣif*) 到十三世纪的伊本·巴伊塔尔 (*Ibn al-Baitār*, 1197—1248) 都不断地介绍中国和南海区域的药草。到了近代，西方医学界和文化史界，则更是空前地重视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研究。英国李约瑟博士 (*Dr. Joseph Needham*) 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全面论述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创造与发达，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原要儿子也学医，但儿子学了生物化学；李博士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是受了他的中国学生鲁桂珍的影响，而鲁女士的父亲是一位中医，所以实际上这一庞大的研究系统是从中国医学史开始的。美国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专家席文教授 (*Prof. Nathan Sivin*)，在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组织了“中国科学、医学及技术”研究系列，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医名著和介绍中医学说的书。日本在盛行中医临床的情况下，也数次掀起了研究汉医和汉药的热潮，武田制药株式会社设立的研究中心是极为著名的，中心附设的“杏雨书屋”藏书楼，是日本收藏中医药古籍最为丰富的专业图书馆。

在这种情况和趋势下，西方各国十分企望能读到我国专家为他们撰写的有关中国传统医学史的著作，使他们能在了解和应用两方面都得到益处。因此，北京外文图书出版社在七十年代的早期，邀请医史学家傅维康大夫针对这一目的写

了一本《中国针灸史话》，译成英文于 1975 年出版后，迅即受到外国读者的广泛欢迎。美国医学界写信给外文出版社，称许“《中国针灸史话》文字简明，摆脱了铺张炫耀的文风”，说它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针灸基本原理和发展历史，并使读者洞察到今日中国的医学是用于为人民服务的。赞赏“这本书很有意思”。纽约有位吉世温医生 (*Dr. Max Geshwind*) 写信希望“看到傅医生更多的著作”。因此，外文出版社再请傅大夫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中国传统医药学史。他写了一本简明的史话，分别译成英、法两种文本次第出版：英文本名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1985 年出版；法文本名 “*Abrégé de la Médecine et de la Pharmacologie chinoises*”，1987 年出版。英国李约瑟和鲁桂珍两位老博士获得此书英译本之后，写信给作者，表示读后感到十分有兴趣，并把书交给他们建立的东方科技史图书馆收藏，以供众览。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讨论会 (5th ICHSC) 主席、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程贞一教授读过此书后，称它是“一本内容丰富而叙述简明的至为有用的佳著。”意大利罗马 *Paracelso* 学院中医部主任佩蒂 (*F. B. Petti*) 读了英译本后，对傅大夫在书中“精确地表述各种题目的能力表示敬仰”。他要求傅医师同意作为他们于 1987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在罗马举办“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针灸、药物、卫生展览会”的合作者之一，并把傅维康大夫名字、简历及其书中部分内容载于他们印行的展览特集之中。比利时根特 (*Ghent*) 城一位妇产科医院院长赛雷 (*M. Thiery*) 读了傅医生的书后，写信要求多多提供有关妇产科方面的中医史资料。阿尔及利亚的奥兰 (*Oran*) 城医生蔡玛 (*Dr. Allel Chama*) 则表示，读了法文版这本书，对于中国古代的卫生措施和预防医学感到意外的兴味。法国贺齐医生 (*Dominique*

Hoizey) 撰著法文《中国医学史》(*Histoire de la Médecine chinoises*)一书时，也从傅医师书中引用了一些资料。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波幅可是多么宽广呵。但颇感遗憾的是，傅医师的这本医史著作却还没有中文本，国内反而很少知道此书者，这岂不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吗？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鉴于此，决定出版此书的中文本，使这朵花在墙里也要香飘满园。这是个值得庆幸之举。无疑这也是傅大夫的心愿。为适合国内读者之需，他把多年以来积累的资料与研究心得，提精取华，写成这本内容丰富正确、文笔简练生动的《杏林述珍》。这并非简单地把外文原著回归为汉文的译作，而是在已有的成功的、载誉的原著基础上，踵事增华，精益求精，三易其稿而写成的一本力作。书中对于中医学起源、古代中医药名著、中医临床治疗成就等多方面都有细到的载论，此外，按摩、针灸、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以及中国古代卫生和预防医学史，也均有许多珍贵的资料和新鲜观点的阐述。书中十分重视祖国的医学道德，以专篇叙述了这种优秀的传统，介绍了董奉、孙思邈等历史上名医的可贵医德。因此，这本医史著作在医学界内外，都能起到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作用，并获得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社会效益。

傅大夫出身于福建汀州西医师之家，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担任临床医师，1958年起转而潜心钻研中医学文献，笃志医史研究，他继承和弘廓了王吉民老医师(1889—1972)创建的中国第一座医史博物馆事业，能于掌握书面文献记载之外，拥有可靠的文物考古材料来作有力的说明。傅大夫是上海中医学院的医学史资深教授，历任该学院医史博物馆馆长、医史教研室主任等，曾受聘为卫生部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中华医史学会副主任委员，编审、主编

出版了有关中国医学史及医学专科史著作多种。所以，撰写这本雅俗共赏的著作，对他来说是游刃有余，不过，他在撰著之中，也从没有简单从事，仍保持他一贯严谨的作风。

医学和农学是应用生物科学的两大分支，他们之间有天然的联系，而中医药与传统农业之间更有千丝万缕的相互关系。前辈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曾对我说：“医农相通”，我举为至理名言。我于医学未曾学问，然因治农学史之故，于医学史向来关心，医史诸书，几乎无不揽读。十年动乱之中，我陷于冤狱，平生所聚，散毁无存。1976年后，天日重光，平冤出狱，重建书藏，首先读到的医史文章，就是傅大夫在《群众医学》上的连载，钦其学识，遂谋缔交，相知已十二载，他的所有撰作，几乎无不收藏，知交日久，更为钦佩他的德操。值此《杏林述珍》稿成，先睹为快，欣喜之余，率尔作序，以抒胸臆。失虑之处，则求多方包涵。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日南皖 胡道静序

自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发源地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人民群众作出了无数的发明创造。中国医药学就是其中伟大的成果之一。

自古以来，丰富多彩的中国医药学，不仅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繁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传播到国外后，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医疗保健，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医药学上的发明创造及其宝贵的经验与知识，不断地丰富了世界科学的宝库。

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出现了空前规模的“中医热”，中医中药在世界上获得了愈来愈多人的信赖。为此，北京外文图书出版社于1979年约我写了一本适于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医中药历史与成就的读物。因此，我选择了比较重要而且是国外读者感兴趣的内容，分为19个专题，从医学史的角度写成《中国医药历史漫话》一书，由外文图书出版社译成英文于1985年出版，接着又译成法文于1987年面世。

上述两种外文本出版后，国内外一些科技史学者和读者先后来信，谈到他们阅读中的兴味和收获，有的读者还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这使我很受鼓舞。兹根据国内读者之实际，在

上述外文版内容的基础上，予以较多的补充，另行写作了这本《杏林述珍——中医药史概要》中文本，希望对读者同样能有所兴味和裨益。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中医药文献是十分之浩繁，其内容又是极其丰富，而作者的精力、见识与水平却非常之有限，因此，本书未能对我国医药历史成就作面面俱到的介绍，内容也可能有不正确之处，期望读者能予谅解和指正。

本书写就后，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员、国际科学史研究院(AIHS)通讯院士、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胡道静先生，于百忙之中欣然为本书写序，在此深致感谢。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于上海 傅维康

目 录

序.....	胡道静	1
自序.....		1
从“神农尝百草”谈起.....		1
中国最早有关医药的记载.....		6
中医学的第一次大总结——《黄帝内经》.....		10
现存最早的中医学专书——《神农本草经》.....		23
第一部中医临床诊治专著——《伤寒杂病论》.....		28
一千六百年前中医急救手册——《肘后救卒方》.....		33
最早的国家医学院和药典.....		38
七世纪中医学名著《千金方》.....		45
誉称“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本草纲目》.....		52
登大雅之堂的铃医经验集.....		58
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中药剂型的古今.....		62
中国古代的卫生和预防医学.....		68
人痘接种术——世界人工免疫法的先驱.....		79
从“杏林春暖”说到我国古代的医德.....		85
元老医术话按摩.....		92

神奇医术说针灸	100
从“蒙汗药”谈到中药麻醉	111
古代中医外科的成就	117
古代中医妇产科的成就	133
中国古代论育幼和养老	141
古代中医对癌和瘤的认识	151
传染病学上的杰出篇章——《温疫论》	157

从“神农尝百草”谈起

历史上，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

谈到医和药，我们中国从很古老的时候起，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古代不少文献记述了这个传说。

在两千年前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里写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意思是说，“神农”一天之内尝了一百种植物的滋味，同时也尝了各种水和泉的味道究竟是甜的还是苦的。结果，在一天里面有七十次吃到了有毒的东西。因此发现了药物。

一千多年前司马贞的《史记补三皇纪》中也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上面这两部书里所讲到的两段话，都写到了“尝”这个字，就是说，最初的医药学知识，是人们通过“尝”过之后才获得的。这个“尝”的过程也就是实践的过程。人们是经过长期的实践之后，才逐渐地取得真知的。

然而，这个尝百草的“神农”，是不是一个神异无比、能力无穷的人物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试想，即使是再奇特的人，若是在一天里面尝了一百种植物，其中竟吃到了七十种有毒的东西，那怎么经受得了呢？不说中毒七十次，即使是中毒七次，他肚子里早就“翻江倒海”，脑子里不由得“天旋地转”，严重中毒则危

及生命，还安宁得了吗？那是无论如何也胜任不了的！因此，尝百草的无疑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正是人民群众的长期的实践，才逐渐地发明并发展了医药学的。

既然，最初的药物是人们经过尝试之后才发现的，那么，古代人们又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尝百草”的呢？

这个还得追溯到“中国猿人”的生活时代。

根据我国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地质学等的研究结果，以及从历史文物的发现来看，可以帮助我们逐渐地增多对原始人类的了解。截至目前的发现所知，远在距今约二百五十万年前，在我国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就已经生存繁衍着世界上最早人类之一种——中国猿人。

一九七八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山西省的桑干河畔，发现了一处人类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据测定距今约有二百五十万年①。

一九六五年，我国在云南省元谋县地区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之后，在上述地区又挖掘出了旧石器和灰烬。据考古学的推测，“元谋猿人”是大约生存在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左右的原始人类②，但据八十年代再次测定，认为距今约二百万至二百五十万年前。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北京西南的房山县周口店，曾经陆续地发掘出了约四、五十万年以前“北京猿人”洞穴的遗址处，发现有以石块制成的简单粗陋的工具，也有火烧过的兽骨与灰烬。从上述发现，可以证明，约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

① 尤玉桂、李毅：《桑干河畔的早期祖先踪迹——记泥河湾地层旧石器的新发现》。《化石》1979年第1期。

② 1976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人”，已经能够制造和运用一些简陋的石器，并且知道利用火了。而“元谋猿人”则似乎有过用火的迹象。

对于火，人类最初只是利用天然的火，后来才逐渐地掌握了人工摩擦生火的方法。

人类对火的使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项巨大的进步，它对人类的生活、医疗保健以及社会生产等来说，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对此，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里给以极高的评价，他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因此，中国猿人与动物有了根本的区别。而劳动则是促使最原始的人类与动物界产生本质区别的决定性因素。

原始人类通过长期地与自然界斗争和劳动实践而不断地进化，渡过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逐渐地形成了最初的人类社会结构——原始公社。在这个时期，生产资料是集体公有的，这时期的生产力是非常之低下，人类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住的是山洞，穿的是鸟羽兽皮。他们经常要防御和经受外界不良的自然环境的侵袭与影响，又要抗击和躲避猛兽害虫的伤害与搔扰。在还没有发明农业生产之前，他们必须经常地从原野中去寻找食物来充饥，维持生命活动。

最初阶段，原始人类在寻找食物充饥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哪些东西是可吃的，哪些东西是有毒不能吃的。因此，在那种“饥不择食”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吃进不合适的甚至有毒的东西，结果使人体出现皮肤发痒、腹痛、呕吐、腹泻、头痛等等症状，甚至有时引起昏迷、死亡等严重的中毒情况。另一方面，有时候人们也因吃了某些东西之后，减轻或消除了原有的腹痛、腹泻、呕吐、头痛等症状。

通过这样无数次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地认识到哪些东西是可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哪些是会使人产生某些不适症状甚至引起中毒死亡的，哪些东西却能减轻或消除人体的某些病痛的。于是，以后当人们出现了某些病痛时，他们就根据以往的经验，去采用能够减轻或消除人体病痛的东西来治疗，这是人类认识药物的起源，中国医药学也就是在这个实践的基础上萌芽和发展起来的。

由于自然界中有着品种繁多、资源丰富的植物，所以原始人类寻找的食物绝大多数是植物类。因此，最初所发现和认识的药物，也大都是植物类药物。汉文“药”字之所以有草头偏旁，也正是这个缘故。

起初阶段，人类寻找来的食物都是生吃的，这就难免会招致一些疾病，尤其是胃肠道疾患更容易发生。《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民食果蓏[音裸 luǒ]①、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当人类懂得了对火的利用之后，食物由生吃进步到熟食，这样一方面减少了疾病的發生，促进了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作用；另一方面又扩大了食物的来源，进而增加和积累了一些动物药的知识，同时也增加了对某些植物药的新认识。

此后，人们不仅逐步地知道怎样去避免、防止有毒的东西所引起的中毒事件，而且也渐渐懂得利用某些毒药涂抹于箭头上，用以射杀飞禽走兽。

原始人类在日常生活之中，有时不免会遇到某些外伤，而当他们同野兽搏击或部落之间争斗冲突之时，发生创伤的可能性就更大，因而引起人体某些部位出现破损、出血、肿胀、疼

① 蘰：瓜类植物的果实结于地面部分者。

痛等症状。当时，他们往往是就地取材，或用泥土、苔藓、小草之类涂敷伤口，或用树叶包扎，逐渐地发现了某些消肿、止痛的外用药物。这是原始的外伤救护法，也是外治法的起源。

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为医药学的不断进步创造了条件。当我国的先民发明了农业生产之后，他们逐步地从流动性的生活过渡到定居的生活，因而他们在栽培植物的过程中，有可能对农作物和某些植物的生长情况及其特征等，进行较长期的观察，也可以对农作物和某些植物进行有意识的尝试利用，这样既扩大了植物类食物的范围，同时也促使人们发现和认识了更多的植物药。

由此可见，医药学就是人类在创造物质生活和从事生产劳动的长期实践中产生的。宋代杰出的科学家沈括曾经正确地指出：“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圣人？百工、群有司①、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②就是说，各种技术、器械等的发明创造，并非全然出自“圣人”之手，而是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所参与获得的。而医药学，同样也是通过人们的长期实践，才得以不断地发展和丰富起来。

① 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称“有司”。

② 沈括《长兴集·上欧阳参政书》。